

高适与岑参

□ 顾 农

高适(700~765)和岑参(715?~770)乃是盛唐时期两位齐名的大诗人,都以边塞之作蜚声文坛,一向相提并论。他们两位共同的朋友杜甫有诗云:“海内知名士,云端各异方。高岑殊缓步,沈鲍得同行。”(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)宋代著名诗评家严羽说:“高岑之诗悲壮,读之使人感慨。”(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)选取他们两位作品的精粹合编为一集,有着充分的依据,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高适,字达夫,《旧唐书》本传说他是渤海蓨县(今河北景县)人,《新唐书》则说是渤海郡人,这些都是所谓“郡望”,亦即历史上该姓氏出过若干显贵高官和文化名人的地方,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籍贯。实际上他是洛阳人,一个低级官僚的后代。高适青少年时代曾随他父亲到过现在的广东、福建一带;二十岁时到首都长安寻找出路,当过一段“京漂”以后,发现没有成功的希望,就回了故乡;不久东迁至宋(今河南商丘),躬耕于梁园废墟,其间曾多次外出漫游,到过现在的河北、辽宁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的许多地方,混迹于渔樵、士兵、隐士、赌徒之中,也同不少中、低级官员往还;后来又曾一度寓居于淇上,仍然经常外出漫游,与李白、杜甫以及一批地方官均有交往,但他本人始终没有体制内的正规身份。一直混到五十岁,高适才得到一个陈留郡封丘县(在今河南)县尉的职务,总算是进入了官场。

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,没有什么人来管他,高适养成了热爱自由、不拘小节的作风,以及关心弱势群体、敢说敢骂的侠士豪情。他

当了封丘县尉以后深感不能适应,逢迎长官欺压百姓这些事他做不来,遂作诗大发感慨道:“我本渔樵孟诸野,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泽中,宁堪作吏风尘下!”(《封丘县》)

高适是一位草根政治家,很喜欢高谈政治,尤其善于从战略角度考虑重大问题,有所谓“王霸大略”(《旧唐书》本传)。一个专注于宏观问题的人,一般总是不耐烦也不善于处理微观琐事,而县尉恰恰是专门要做琐事的,所以干了不长时间,高适就从这里逃离,跑到陇右节度使(驻鄯州,今青海乐都)兼河西节度使(驻凉州,今甘肃武威)哥舒翰将军的幕府里去效劳,在河西呆了三年。

唐代的节度使可以自行征辟僚佐,不少士人由此开辟自己的道路。到边疆去干事业找出路,在盛唐时代很有吸引力。哥舒翰当时声望很高,杜甫也曾希望到他手下去工作。

高适的不少作品涉及大唐王朝的东北、西北两处边塞。先前他在开元十八年(730)至二十年(732)期间曾北上蓟门、营州,在燕赵一带漫游多时,很可能还直接从过军,虽然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出路,但大大增加了他对东北边塞,对那里的军队特别是其下层的了解。天宝八载(749)至十一载(752)担任封丘尉期间,因为送兵的关系,他又去过幽州边塞。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如《燕歌行》等等,大抵与东北边塞有关。关于西北边疆,入河西幕府后高适也写过不少诗篇。

高适比岑参年长十多岁,成名较早,在殷璠编选的当代优秀诗歌选《河岳英灵集》(以天宝十二载为下限)里,高适的边塞诗代表作已经入选,而岑参还没有写出什么边塞诗来,他这时还只是以描写风景和其他题材见长。

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王朝带来史无前例的大灾难,却给了高适一个施展其政治才略的机会。他先是辅佐哥舒翰守潼关,兵败后追随玄宗入蜀,与这位已经老糊涂了的皇帝直接对话;稍后他“南出江汉”(《谢上彭州刺史表》),北上彭原行在,向新上台的肃宗皇帝汇报情况,面陈机宜,在抵制诸王分镇、防范永王璘谋反这些重大问题

上立了大功。当时加强中央集权、统一军事指挥是完全必要的,高适的意见切合时宜,非常地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肃宗的心愿,于是他破格提拔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(驻扬州),一下子进入了高官的行列。

由于受到小人的谗毁,高适在扬州没能呆多久。后来他改任太子少詹事、彭州刺史、蜀州刺史,迁西川节度使。在四川,他直接介入和领导了西南边境对吐蕃的斗争。分析宏观的政治问题,充当高级智囊,高适确有他的一套,而处理具体的军政事务则非其所长。这就是《旧唐书》本传说的“言过其术”。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让他更多地顾及弱势群体的当下利益,而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思考有时则不免会受到干扰。

高适自知不善于做具体工作,要求调回中枢,遂入朝为刑部侍郎,转散骑常侍,进封渤海县侯。唐代诗人中担任高官并且封侯的,似乎只有高适一人。可惜他回长安不久就在永泰元年(765)正月去世了。赠礼部尚书,谥曰“忠”。

岑参籍籍南阳(在今河南),出生于江陵(今湖北荆州),新旧《唐书》皆无传,而他的家族背景却要比高适显赫得多。在并不算远的先辈中,岑家先后出过三位宰相,除了曾祖父岑文本以外,其伯祖父、堂伯父两代宰相都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栽掉了;岑参的父亲虽然当过两任刺史,但死得过早,所以到他这一代,家族的中衰之势已十分明显了。岑参背着一个沉重的家族包袱,非常热衷于重振家声,光大门楣,在他的作品中感慨家世、希望升迁的调子唱得很高,这同高适那种热爱自由、张扬个性的格调颇有差异。

岑参于天宝三载(744)进士及第,出仕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。这样冷冰冰的闲散微官同他的人生设计相去太远了,不久他就弃官出走,到边疆去寻求远大的发展,他把家属留在长安郊区的家园里。

岑参先后两次出塞,前一次在天宝八载(749),他抛弃无聊的小京官,跑到老远的安西四镇节度使(驻龟兹,即今新疆库车)高仙芝幕府去,呆了近两年;第二次在天宝十三载(754)再次出塞,到北庭

节度使(驻庭州,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之北)封常清幕府去,呆了将近三年。岑参走得比高适要远得多了。他那些优秀的边塞诗主要是他后一次远赴天山北路时创作的。

岑参第一次出塞时,官职比较卑微,又不大适应边疆地区的气候和生活,此时创作的诗中虽然也生动地描写了前所未见的自然景观,同时也多有思乡之泪,佳作不算多。第二次就不同了,封常清将军先前曾与岑参一起在高仙芝幕府任职,其人文武全才,升迁很快,对老同事相当礼遇;岑参本人的官职遂颇有升迁,此时他不但已能适应边疆的生活,且情绪相当高涨。其时北庭辖区内形势稳定,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战事,却不断取得某些对于外族小小的胜利,于是岑参不仅情绪高昂,而且得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饱览天山南北的大好风光,写出了更多极富特色的边塞诗,其中充满了奇异的景色和浪漫的豪情,《走马川行》等一批佳作成了“盛唐气象”的著名代表作。

安史之乱爆发后,封常清被调回去保卫长安,他没有带军队,回到内地后临时招募了一些新兵,这样的乌合之众自然不堪一战,兵败后封将军作为一只替罪羊被玄宗诛杀。失去依附的岑参不久也回到内地,因老朋友杜甫等人的推荐,得以进入尚在流动之中的肃宗朝廷,担任一名谏官。等到肃宗回到长安、局势稍稍稳定之后,太喜欢提意见说真话的岑参很快被外放为虢州长史。他先前设想过的在边疆或朝廷建功立业、实现人生理想并获取高位的金光大道是走不通了,不禁大为失望,常常在诗里提到打算归隐,但这不过是发牢骚的意思,岑参是不可能归隐的,只不过觉得当一个州郡佐吏实在无聊之极罢了。

后来岑参被调回朝廷,多历沉浮,最后当过几任郎官,永泰元年(765)出为嘉州刺史,由于当时蜀中发生了崔旰之乱,一时无法到任,于是就在朝廷派往蜀中解决问题的杜鸿渐将军幕府中呆了不少时间,杜鸿渐位高而无能,岑参在这里没有做成任何事情,稍后他到嘉州就任,期满后没有得到新的任命,想回长安家园又回不去,悬在

半空中备受煎熬,大历五年(770)初病逝于成都客舍,享年不到六十岁。

岑参重振家声的目标没有实现,在诗歌创作方面则取得很高的成就,陆游甚至说他是“太白、子美之后,一人而已”(《渭南文集》卷二《跋岑嘉州诗集》)。这在他是不幸还是幸运?

高、岑以边塞诗著称而且齐名,但他们两位颇有异同。

相同的是,高适、岑参二人都亲自到过边疆,有着丰富的见闻和深厚的生活积累,遂与过去那些仅凭想象写边塞诗的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东晋南朝的诗坛上,也曾有人写过边塞诗一类的作品,那时南方的汉族政权举行过几次北伐战争,取得过若干胜利,也吃过若干败仗,舆论上总是常常会谈谈到收复中原这一话题,诗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激动人心的题材,试略举两首来看:

羽檄起边庭,烽火入咸阳。征骑屯广武,分兵救朔方。
严秋筋竿劲,虏阵精且强。天子按剑怒,使者遥相望。
雁行缘石径,鱼贯度飞梁。箫鼓流汉思,旌甲被胡霜。
疾风冲塞起,沙砾自飘扬。马毛缩如猬,角弓不可张。
时危见臣节,世乱识忠良。投躯报明主,身死为国殇。

——鲍照《代出自蓟北门行》

关山三五月,客子忆秦川。思妇高楼上,当窗应未眠。
星旗映疏勒,云阵上祁连。战气今如此,从军复几年?

——徐陵《关山月》

这些作品看上去很美,其实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,只是发挥乐府旧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。例如《出自蓟北门行》一向是要“言燕、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”(《乐府诗集》卷六一引《乐府解题》)的,鲍照一生未尝到过燕、蓟,写这样的题材只能就传统加以敷衍,尽管他具有很高的才华,作品比较概念化一般化仍然是免不了的。《关山月》的传统主题是“伤离别”(《乐府诗集》卷二三引《乐府解题》),所

以徐陵这一首的着力点就落在“思妇高楼上,当窗应未眠”这两句上,其他全是陪衬;徐陵虽然出使过北方,但走得并不远,秦川、疏勒、祁连等地对他来说只是书本上的概念,是几个没有什么感性内容的边塞符号而已。

与这些纸上谈兵的老前辈不同,高适和岑参亲自到过边防前哨,他们写东北、西北边塞的生活、战斗、矛盾和风光,都有就近的观察,切身的体会;其作品同过去那些只凭想象的篇什相比,意味和深度都完全不同。像高适的《塞上》、《营州歌》、岑参的《火山云歌》、《轮台歌》等等,没有亲临其地的人是根本写不出来的。

殷璠评诗人崔颢(与高适、岑参大体同时而年辈略高)云:“晚节忽变常体,风骨凛然,一窥塞垣,说尽戎旅。”(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中)崔颢的边塞生活经历远不如高、岑那样丰富深入,已能取得不俗的成绩,此事颇可深长思之。包括崔颢以及王之涣、王翰、王昌龄等在内的盛唐边塞诗人,全都到过边塞,而以高适、岑参二人呆得最久,诗也写得最多。

高、岑的共同点还在于,他们都有高昂的爱国热情,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对于人生的信心。试看他们热烈的诗句:

杀气三时作阵云,寒声一夜传刁斗。

相看白刃血纷纷,死节从来不顾勋。

——高适《燕歌行》

自逐定远侯,亦著短后衣。近来能走马,不弱并州儿。

——岑参《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》

大笑向文士,一经何足穷!

——高适《塞下曲》

一生大笑能几回,斗酒相逢须醉倒。

——岑参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

高适和岑参都是中国国力最强大的盛唐时代的诗人,又都持积极入世的态度,有些相同之处是十分自然的。

高、岑还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他们写诗都十分真率自然,不屑在

锻句炼字中讨生活。宋人刘克庄说:“高适、岑参,开元天宝以后大诗人,与杜公相颉颃,歌行皆流出肺肝,无斧凿痕……其近体亦高简清拔。……郊、岛辈旬锻月炼者,参谈笑得之。词语壮浪,意象开阔。”(《后村诗话》后集卷二)苦吟当然也有它的妙处,但写起来费神,读起来吃力,在盛唐时代的豪迈之士看来,大约一定不如痛痛快快有话直说为好。

但高、岑边塞诗的内容取向和作品风格也很有些不同。前人早已注意及此,明人王世贞说:“高、岑一时不易上下,岑气骨不如达夫道上,而婉转过之。”(《艺苑卮言》卷四)清人王士禛说:“高悲壮而厚,岑奇逸而峭。”(《师友诗传续录》)如此等等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:

高适的边塞诗写景无多,他习惯于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,对观察所及的现象和问题发表意见,时时流露出政治家的风采。他对当下政治、军事、社会的得失看得比较清楚,对底层的民众和士兵怀有深厚的同情,一再见之于诗篇。过强而直露的理性往往容易使诗味受到损伤,幸而这样的情形不多,高适善于融理于情,其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:质朴雄浑,悲壮慷慨。

岑参最看重的是自家的“世业”和个人的前途,他对民间疾苦一向不甚关心,更没有什么“王霸大略”。相对于高适的严肃深刻而言,他相当潇洒风雅。如果说高适是诗人兼政治家,那么岑参则只是一位诗人。岑参诗一向以写景为多,“语奇体峻,意亦生奇”(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上),他风格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:壮丽峭拔,奇特新颖。

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五引《吟谱》云:“高适诗尚质主理,岑参诗尚巧主景。”这样的比较论可谓知言。

换一个角度看,高适师法汉魏,尤尊建安,杜甫称颂他“方驾曹(植)刘(桢)不啻过”(《奉寄高常侍》);而岑参则更多地接受六朝的文学遗产,“时议拟公于吴均、何逊”(杜确《岑嘉州诗集序》);杜甫称颂为“谢朓每篇堪讽诵”(《寄岑嘉州》)——谢朓、吴均、何逊都是齐梁时代的诗人,而且以写景著称。既然高、岑对过去的遗产有着不同

的师法取向,那么岑诗气骨略逊而以婉缦见长,就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了。

高、岑两位诸体兼擅,但亦各有专长,高适长于五、七言古风,五古占了他作品的一半,名篇则多出于七古,例如《燕歌行》、《邯郸少年行》、《封丘县》、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;岑参最长于七言歌行,他第二次出塞时写的那些描写天山南北风光风情的名篇,如《轮台歌》、《走马川行》、《白雪歌》、《热海行》等等,大抵用这种形式,其章法和用韵都大有讲究,形成所谓“岑嘉州体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)。

高适和岑参也都能作近体诗,高适的五、七言绝句和岑参的七律、七绝都有脍炙人口传诵很广的名篇。只有诸体兼擅才能成为大家,当然这并不妨碍诗人们各各有其特长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高、岑虽然一向以边塞诗出名,其实这一方面的作品在他们的集子里只占少数。岑参的边塞诗是最多的,现存七十来篇,也只占他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弱,高适的边塞诗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。他们两位的诗作涉及到广泛的题材,诸如山水、时政、赠答、送别、行旅、登临、怀古等等,无不毕备。

(作者单位:扬州大学文学院)

学术动态

2008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,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南京大学《全清词》编纂研究室主办的两岸三地清词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隆重召开,两岸三地词学研究专家七十余人共济一堂,叶嘉莹、林玫仪、吴宏一、施议对、邓乔彬、杨海明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。大会对清词研究各个层面进行了全方位、多角度的探讨,进一步推动了清词研究向纵深发展。